

·新 论·

# 新一轮院校改革：问题讨论

杜作润

(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要:**对新一轮大学院校或高等教育改革,本文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包括:应该首先回顾或反思我们既往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大学理想、目标、使命、功能等方面寻求相啮合的结构和机制,以及在教育实践中坚持德育为先的原则思路等。

**关键词:**新一轮改革;大学制度;教授会;德育为先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1-0005-04

## An Analysis of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o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U Zuo-ru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o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first of all look back on our previou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this realm. We also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and exploit ou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ry to seek for some harmonious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n such aspects a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ir idealities, goals, missions and functions. In addition, we should persist in the principles of all-around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first.

**Key words:** New Round of Reform; Collegial Institution; Professoriate; Moral Education First

新一轮的大学改革,必然会以创新的名义提出、制定许多宏大的发展计划、规划或法规、规章、规定等等。一般来说,这是人们决心进一步发展和前进的激情表达,虽然有人从自我经验中悟出不可能有那么多创新,嘲讽那只是一种“创新”依赖情结的反映。但我却认为,如果真有创新,我们还是应当支持和鼓励的。这里,关键是真的有创新。如果只在打着创新的时髦旗号,变换着与这些规划、规定相关的文字文本,甚至只在发明新的“提法”或借新的文件中的提法做文章,而丝毫不顾及我们的既有实践,丝毫不检查和反思我们曾经有过的情况,这样创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使国家教育拨款达到国家预算的某个指标数字之上的创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创新,建立校务委员会的创新,学校分分合合的创新,建立二级学院

的创新,把学系升格为学院的创新,素质教育的创新,民办学校傍名校的创新,高速度跃进大众化的创新,等等,我们能据此豪迈地列数出我们所做的许多功不可没的工作,但到今天甚至无人有兴趣去指出它们的创新何在,没有人有兴趣去研究这些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它们带来的问题,也没有人愿意用这些创新成果去认真回应民众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sup>①</sup>。这,就是笔者想提请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粗浅提问,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新一轮改革的领导人和所有参与领导的人,以及参与改革的其他群体,包括必不可少的参与群体——教师,都要确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都要认真检查、反思我们既往的所有高等教育改革,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给我们带来的进步和僵局,实事求是地分析引起进步或僵局的根源。非如此不足以消除人们对以会议

代改革、以文件代改革、以领导的重要指示代改革、以舆论宣传代改革的受折腾心态和疲倦感。

总而言之,学习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特别是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是新一轮改革的第一堂必修课;检查、反思我国高教改革的既往情况,则是第二堂必修课。

## 二

回眸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确有成就。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很多,这就是重要成就之一。单就研究论文的数量而言,每年就有数万篇,如果再加上数十部大部头的专著,成果之丰盛,可能早已是世界第一。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新一轮改革,除了前面所说需要充分利用我们的经验资源而外,是否还应当充分重视应用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它们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如证明某些方针、政策、理论正确,提出或引介国内外的许多新理论、新方法、新思维、新模式,批评某些机制、认识、惯例、决策有问题甚至全然错误。为了全面深入地进行改革,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些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一种机智的讨巧,同时也是对继续发展研究的鼓励和示范。顺便附加的效果,则是用事实来回应人们不时发出的对高等教育研究无用的论文太多、资源浪费太严重的批评。应当说,过去我们的各级教育领导,包括学校里的校长、书记等,由于成天陷在繁忙的具体事务中,无暇顾及这些理性认识资源的价值,尽管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具有中国特色地兼任了教育研究刊物的主编等职务。新一轮改革,首先应开始真正重视科学研究,真正建立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开发、应用机制,我们的教育和高等教育新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具有科学发展的底蕴。

所以,我的建议在这里也很明确:新一轮改革还要以我们既有的教育研究的理性思辨成果为一个方面的起始条件,努力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在真实的需要中,为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结合,树立一个榜样。当然,如果这些成果的大部分,不幸真的与我们的新一轮改革都对不上号,那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本身,也应在改革和坚持科学发展的视野之中。

## 三

进入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以后,许多情况让我感到首先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sup>[1]</sup>从国情来看,制度建设是中国政治转型、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得以持续进步的首要条件。在这些方面,科学发展观必须落实到一种科学的制度之上,而大学的制度建设,是在国家制度建设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没有制度这个事实基础,把历史上有过的、国外有过的有关大学理念或大学使命和功能的陈述以及大学现代化的讨论全部搬出来,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只能是一种文学化的激情宣泄。因为在今天现实的大学制度条件下,我们经常反复陈述的蔡元培的命题、洪堡的思想、纽曼的理想无法真正再现,并且既形似,更神似。这里首先涉及的院校制度建设,或许是表现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窗口,但不可能完全类同于企业的制度建设,不可能完全类同于党政组织和机构的建设。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本逻辑内涵应当包括的价值理念、社会行动、治理机制等<sup>[2]</sup>。作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社会精英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高等院校,因国家民主化进程的要求,在这些方面都应当有所表达、有所表现。

反过来看,为了进行制度建设,我们又要弄清: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究竟应该为什么样的大学精神而奋斗?应该为什么样的大学理想而努力?我们大学的学术权力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究竟在那里?我们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大学制度和这些论题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逻辑因果关系,不可能靠小聪明、拍脑袋找到答案,也无法拜托高人以一言九鼎的指示来解答。我认为,这必须通过相关的人群,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来解答,而且只能循序渐进。这个大讨论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常态。它既是新一轮改革的开端,也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更应该是新一轮改革的结果。

## 四

制度建设中,更具实质性的深层问题,那就是党如何领导高等院校的问题。

一般来说,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进步的主旋律。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里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具体到高等院校,这里的人民,其主体是教授、教师,还有其他的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人,是在为发展国家科学事业、培养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之人才的人

民,是在探索未知世界、追寻人性完美和谐的人民,是在发展、创造、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人民,是需要理想、需要精神、需要沉思、需要钻研、需要创造、需要宁静环境的人民。这里人民的与众不同的目标追求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更需要民主,更需要当家做主。但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校内的所有重要事务,都由上级或党委决定,可以说还是绝对领导。选举,包括党内选举,包括校、院、系班子的选举,都是党委提名、确定候选人名单;书记、校长等,基本上也都是“空投”或“天降”,这里的主体们,基本上没有发言或评论的机会;决策,包括上大项目、评先进、树典型、订规划、报成绩,也基本上由党委拍板定调;管理或监督,主体们更是只能仰望、敬畏、服从,效能低,潜规则多,无法进入角色。尽管在一所具体的学校里,可能有管理学院或法学学院,有许多相关专业领域的闻名于世的教授、专家,但面对自己的学校、自己学校的事业,他们始终只能是被动的被管理者或被监督者。尽管许多书记或校长是挂了名的教授、博导,但他们中深入到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很少、很少,与第一线的教师共话的更少。领导人高人一等的官员化人格的自我定位,害怕大权旁落,害怕驾驭思想之缰绳失控,是高等院校民主氛围淡薄甚至不及一些偏远乡镇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民主所包含的社会治理机制,在高等院校都无法实现,这特别值得讨论和深思。因此,大学制度建设,党对学校的政治领导,推进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和科学发展,赶超世界一流,必须从这里的制度创新开始。

总之,不断加强的所谓“科层化”的领导和管理,包括不断扩大的两套领导班子队伍,不断增设的部门、机构和党政官员,使我们的大学院校,越来越像是一级庞大的政府办事机关,下级服从上级,被领导者服从领导者,几乎是一切事情运转的铁定规则。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创新,基本上是从教育外部的行政推动、政治领导开始的,基本上没有教育内在的“民意”反映。基于此,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其症结已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的结构与体制<sup>②</sup>。在学校和教育内部,固守这样的环境,是完全与教育、科研所要求的环境不相适应的,至少,从效率的要求看,新一轮的改革,真的要改出新意,就很难绕过这道关口。

这里,我也只能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至于如何改革,如何跨出这道关口,我还希望请教行家里手。甚至这是否是一个真问题,我也真诚的希望同道朋友批评、指教。

## 五

与上面一点相关联的一个具体问题是,教授、教

师实质性的参与管理问题,包括实质性地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

教授、教师参与校、院、系或学科、专业的管理,从理念的层面看,如前所述,正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民主管理的理念在高等院校的一种反映;从思想的角度看,也是我们长期强调的要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更加主动、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体现;从方法的角度看,也许还可以创造别的参与方法,但以教授和教师为主要组成人员的校务委员会、教授会的组织形式和职能规定,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中,都有成熟的先例,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壁垒障碍,可以现成试用,或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造后试用。新一轮的改革,需要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开始。对其中的许多细节,包括组成人员的遴选,运作的程序与规则,责权覆盖的方方面面,还包括监督和罢免等等,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笔者的拙文<sup>③</sup>也许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参考价值,但为避免赘冗,不复引述。

## 六

本文不打算探讨教学、科研中诸多更微观的改革问题,但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应该在这里稍加探讨,这就是道德教育的问题。

在新一轮的高等院校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真正的科技问题、世界一流问题的重要和紧迫,看到在科学技术上、物质财富上我们与国外的差距这些现实,又要看到眼前的人(包括全体国民,包括大众化场景下进入高等教育现场的大众,包括教育的指导者或当政者,当然也包括推动改革、举大旗的人自己)的表现:看看所有这些人的道德认知特别是道德实践,看看我们这些人的教育素质,看看我们是否应该本着为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情怀,推动全民族的道德建设,看看我们如何真正践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这一发展教育的非常正确而适时的教育原则。

我的具体建议是,首先以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为主要元素,或许还可以有所增加,组织一些教师,编写一部包含基本道德文明元素的教材(其中,特别要注意,经验已经表明,只在“提法”上、在大话上、在口号上动脑筋,是绝对没有效果的)。然后,本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之教,施教于受教育的人们。必要时,还可以诉诸立法。<sup>④</sup>我们要以高等院校的德育为先的文明样本,去引领全社会,把“迎奥运,讲文明”和“迎世博,树新风”的演示性口号,变成全社会恒久的 (下转第15页)